张恨水“抗战小说”中的国家意识及其评价

汤哲声

论张恨水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我认为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他是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创者，创作了为数众多的至今不朽的社会言情小说；二是他是中国“抗战小说”创作量最多的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家意识”最为鲜明的作家之一。第一个贡献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基本完成，第二个贡献则集中表现在他的上世纪30年代至后的创作中。

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存亡就成为了中国最重大的社会忧患，这种社会忧患辐射并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根据。同样，由于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亡华之心不死，对日关系也就成为了“国家意识”最鲜明地体现者，成为了文学作品弘扬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对日本“浪人”在中国的飞扬跋扈的描述在晚请的社会小说中多有描述。将日本作为侵略国家，并以反日作为主要情节的小说，据我所知，最早的大概是叶小凤刊载在1914年、1915年《小说大观》上的《蒙边鸣筑记》。这部小说写日本间谍平小川为了获取中国的情报如何地忍辱负重，书生江南生和女侠李朝阳识破了平小川的诡计，在“胡子”首领铁鹞王的帮助下，擒杀了平小川，挫败了敌国的阴谋。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表现了时代的情绪，还对中国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麻木表示了愤怒和激愤。作者特地将平小川窃取的情报和他对中国社会状态的分析报告公布出来，虽是出自敌人的口中，却句句切中时弊，令人触目惊心。之后在1915年4月《礼拜六》的46期上剑侠根据日本和德国在青岛开战的情况，写了纪实小说《弱国余生记》。该年5月《礼拜六》的51期上王钝根根据日本人在中国的各种罪行写作并开始连载长篇纪实文学《国耻录》，喊出了：“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的口号。此时，周瘦鹃一连写了《中华民国之魂》、《祖国重也》、《为国牺牲》等小说，强调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特别是他在20年代初发表在《半月》上的《亡国奴家的燕子》，用寓言的笔法写了“几个矮外国兵”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的行径，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1931年的“9、18”事件和1932年的“1、28”事变以后，中国文坛上一批“国难小说”开始出现。什么是“国难小说”？施冰厚此时发表了一篇小说专论《爱国小说的借镜》中作了这样的解释：“足以激励爱国之小说，其艺术有正反二面。或写亡国惨痛，读之触目惊心，令人愤慨；或写爱国事迹，可以感奋。然无论如何，欲创作深刻之印象，固不能仅以单纯之观念，就事实铺陈之即已。必有内容，有深度，始可言动人。”（1）“国难小说”就是些写“亡国惨痛”或“爱国事迹”的爱国小说。此时写“亡国惨痛”的纪实作品主要有含凉生的《国难中的苏州》、玉峰客的《国难中之昆山》、叶慎之的《国难中之太仓》以及郑逸梅的《沪变写真》。它们以纪实的笔法写了上海“1、28”事变中苏州、昆山、太仓的社会状况，写了日本军队在上海的烧杀抢掠。上海“1、28”事变引发的难民潮，对此茅盾的《林家铺子》曾有间接的描写，“国难小说”作家们则以此作为直接题材写了不少小说。许廛父的《流离》写难民的生活状况；王天恨的《失落》写“1、28”深夜上海外白渡桥人挤人、挤死人的惨状；徐卓呆的《食指短》写难民战后回到江湾时看见的各种凄惨的情景。这些触目惊心的亡国惨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写“亡国惨痛”的作品相比，那些“爱国事迹”的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程瞻庐的《不可思议》写了一个刻章世家的子弟如何丢下刻刀拿起战刀参加义勇军的故事。顾明道发表小说《国难家仇》，以“9、18”事件为背景，写东北人民如何建立了义勇军奋起抗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除了大量的街头剧、朗诵诗以外，写抗战生活的小说有徐訏的《风萧萧》和老舍的《四世同堂》等。这两部小说，一部写的是敌后的间谍的故事，一部写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和抗争。

将这些抗日小说罗列出来主要是两个目的，一是说明“抗日”自民国初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主题，出现了不少文学作品；二是在比较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张恨水“抗战小说”的特点和贡献。

与这些作家作品相比较，有两个结论相当明显：第一个结论是张恨水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创作“抗战小说”最丰的作家。他直接将抗战作为主要素材的作品近十部，涉及到抗战生活的作品数十部，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这样的创作量首屈一指。第二个结论是张恨水是将“抗日作品”从“国难小说”的层面带入“抗战小说”的层面的作家。他的作品写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害，呼吁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但是，他的注意力显然更集中于写中国人民怎样奋起抗战。不仅仅是受苦受难倾诉，更多的是惨烈、悲壮、感奋的场面描述，张恨水的小说完成了中国的“抗战小说”由“难”转向“战”的提升。说张恨水是中国言情小说大家，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其实，还应该加上一句，他同样是中国抗战小说大家。（2）

很值得思考的是张恨水的这些抗战小说表现出什么样的思想。在我看来，那就是强烈的“国家意识”。这个国家就是正在遭受磨难的中华民国，这是当时的张恨水和所有中国人的祖国；这个意识就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当时的张恨水和所有的中国人的根本所在。在张恨水众多的“抗战小说”中有两部似乎不太显眼的小说，一部是《仇敌夫妻》，一部是《虎贲万岁》，这两部小说从两个侧面体现出这样的“国家意识”。《仇敌夫妻》写一对彼此相爱的夫妻，偏偏来自于中国和日本两个交战的国家。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和对方，但是更爱自己的祖国。妻子为了自己的祖国窃取了丈夫身边的义勇军的机密文件。丈夫发现后，同样为了祖国的利益将妻子毒死了。这部小说情节的虚构痕迹很深，同样的情节曾在民国初年周瘦鹃的小说《行在相见》中见过。由于小说的虚构，曾受到钱杏邨的点名批评。但是我认为此时此刻由张恨水写出这样的小说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张恨水小说一直有着明确的价值判断，人间的感情重于一切，并以此来构思情节，褒贬人物。而这一部小说却出现了相反的价值判断，它显然告示读者，夫妻之情固然是好，但是当它与祖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应该牺牲掉它。理智和功利战胜了张恨水一直维护着的感情和理想，意味着作家价值观念的转向，意味着在强烈的刺激和推动下的作家的意识发生了转型，对写惯了纯情并正处于饱受称誉高峰的张恨水来说，并不容易。与《仇敌夫妻》的虚构不同，张恨水反复强调《虎贲万岁》是一部纪实的小说。但是，由于小说的材料来自第二手资料，小说的艺术的确乏善可陈。然而，这部小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描述以国民党军队为主抗战正面战场的小说。小说写了抗战后期的重要的“常德之役”的始末。小说材料都有根据，作者说得很清楚：“关于每位成仁英雄的故事，我是根据《五十七师将士特殊忠勇事迹》。”“那战事的主要将领，除了书中曾述及的周庆祥师长外，有王耀武、李钰堂、欧震、杨森、王陵基、王赞绪几位将军，这是报纸曾披露过的。”（3）小说完全是赞颂的态度，作者同样说得很清楚：“一师人守城，战得只剩下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完全改变了我的作风。”（4）这些牺牲的人是为国捐躯的烈士，作者不愿留一点污点在他们身上。在大敌当前时，国家的利益为上，这是当时张恨水创作“抗战小说”的基本认识。

与这些“抗战小说”相比，此时张恨水影响最大并受到人们关注的是那些讽刺小说，如写于抗战时期的《八十一梦》以及其后的《五子登科》《魍魉世界》等。这些小说对国民党的那些要员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曾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共鸣和统治者的反感。这些论述在众多论家们的论文中多有阐述。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暴露讽刺小说究竟与那些“赞颂小说”是什么关系，张恨水在这些暴露讽刺的小说中究竟持什么立场。张恨水的暴露讽刺小说与“赞颂小说”的关系。作家自己在《八十一梦》的《自序》中其实说得非常清楚，他说：“盖吾为中国人，自当有以报中国，报国而又在吾职业中为之，未另有所耗于血汗，此最便宜事，奈何不为乎？……吾既立此一准则，故发表于汉港沪者，其小说题材，多抵抗横强不甘屈服的人物。发表于渝者，则略转笔锋，思有以排解后方人士之苦闷。夫治苦闷之良剂，莫过于愉快。吾虽不能言前方毖寇若干，然使人读之启齿一哂者，则尚优为之，于是吾乃有以取材于《儒林外史》与《西游》《封神》之间矣。此《八十一梦》所由作也。”那些写“抵抗横强不甘屈服的人物”的小说也就是“赞颂小说”，那些写“排解后方人士之苦闷”的小说也就是暴露讽刺小说。通过张恨水以上的自述，可以看到，这两类小说是一致的，都是他的报国之所为。对敌战区而言，是要坚决抵抗，是要发扬民族气节；对国统区而言，是要勤政廉洁，是要团结对外。没有内部的勤政廉洁就没有外部的抗战胜利，而外部的抗战胜利需要内部的勤政廉洁做保证，这是他的“抗战小说”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地域不同、读者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共产党对张恨水小说鼓励大家抗日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的暴露讽刺小说给予了更多的赞赏；国民党对他的暴露讽刺小说表示了不满，则对他的那些“赞颂小说”给予了奖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赠送了张恨水礼品，国民党政府也向包括了张恨水在内的一千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其实，此时的张恨水并没有什么党派意识，国家意识至上、民族大义为重是他最高的价值判断。以此为出发点，他与国民党的高官接触，也欢迎共产党的领袖来渝。对于两党的斗争，他虽不明说，但心中恐怕并不赞成，说不定还将其看作为中国社会乱像之一，从他的《八十一梦》之24梦《一场未完的戏》中我们可以有所感觉。

张恨水的这些“抗战小说”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得到满堂喝彩，反而还受到了一些左翼作家的点名批评，其中最有名的是钱杏邨那篇讽刺挖苦的文章《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没有必要对这样的文章作多少反批评，或者为张恨水作多少辩护，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左翼作家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为什么要对这些抗战小说讽刺挖苦呢？心胸狭隘和门户之见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的问题是左翼作家们对张恨水这些传统作家们的文化观念认识不够。虽然也接受了现代西方人道主义观念的影响，张恨水这些传统作家主要秉持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是新时期中的中国传统文人。将文学作为消闲、趣味的对象固然是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学观，但是民族气节作为人格原则被列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然追求文学的消闲趣味，但是在民族气节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人们是从来不含糊的。就以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来说，他们写了很多消闲趣味的言情、家庭小说，他们也写了很多高风亮节的爱国小说，即使是那些充满了脂粉气的小说情节中只要涉及到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严肃了起来，并常常将国家和民族的态度作为小说人物的人格完美的一种升华。作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之作的《玉梨魂》，作者徐枕亚并没有让主人公何梦霞死在温柔乡中，而是死在武昌起义的城楼下。张恨水的这些“抗战小说”创作的根本驱动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气节。钱杏邨这些左翼作家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认识不够，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重视不够，他们的分歧是文学观和文化观的不同。如果要追根寻源就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寻找得失了。

社会和言情是张恨水小说的两大法宝，将社会言情结合起来是张恨水的创造。他前期的作品以言情为主，以社会为辅，这种组合创造了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的辉煌。此时的“抗战小说”以社会为主，以言情为辅，这种组合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就不如前期作品，对此不必讳言。其实，张恨水是一位善于言情，拙于社会的作家，凭着他的人性、人情敏锐的感悟力，他对人性、人情的把握和描述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他对社会的把握主要还是从一个报人的角度出发的，追求和表现的是社会现象的新闻性，描述和评判的是社会风气变幻性。对社会的深刻的分析，他比不上鲁迅、沈雁冰等新文学作家。对此，张恨水不是没有感觉，否则他不会说“到我写《啼笑因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5）然而，到了大敌当前的当头，他心甘情愿地丢掉他擅长的一面，展示他钝拙的一面，为此，他甚至牺牲小说的一些美学原则而不顾，例如《太平花》创作过程中由言情向抗战的突然转向，明知道这样做，是有损于这部小说的完整性，也要硬改过来，为什么呢？那就是民族气节，就是张恨水在多种场合、多篇文章中所说的一个“文人”、一个“书生”在抗战的岗位上“尽其所能”。就凭着这种出发点，我们就应该对张恨水以及他的“抗战小说”高度评价。他的前期的社会言情小说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魅力，他的后期的“抗战小说”展示的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人格魅力。一个伟大的作家只有在将他文学上独特贡献与他高尚的人格素质相提并论时才能显示出他的伟大。尤其是与同时代的那些受到后人很高评价的作家相比时，如周作人、张爱玲等人，张恨水身上的光环就显得更加完美和灿烂。

注 释：

（1）施冰厚《爱国小说的借镜》，载1932年12月1日《珊瑚》第11号。

（2）张恨水的子女张伍说：“在抗战作品中，应该说父亲是走在最前列的，也是满腔热情地为抗战奔走呼号的人。他最早写出了反应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大江东去》，还自费出版了《弯弓集》，他的抗战小说《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巷战之夜》以及写战事的小说《虎贲万岁》，都写得淋漓尽致。他后期的抗战小说，不仅写战争，更重要的是揭发贪污，揭露国民劣根性以及内忧与外患，写出了人性，表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张恨水研究通讯》2005年7月5日第5期）。虽是出自张恨水亲属之口，但这样的评价符合实际。

（3）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载《虎贲万岁》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重版本。

（4）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载《虎贲万岁》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重版本。

（5）张恨水《我的创作与生活》，载1980年《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

**作者简介：汤哲声，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